

博物馆教育和研究的实践探索

Practical Explorations in Museum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周婧景¹ 黄洋² 杨瑾³ 丁福利⁴

Zhou Jingjing¹ Huang Yang² Yang Jin³ Ding Fuli⁴

(1.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2.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3.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 710119; 4. 河南博物院, 郑州, 450002)

(1.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2.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3.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4. Henan Museum, Zhengzhou, 450002)

十字路口的中国博物馆教育： 困境、出路与思考

周婧景

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博物馆正共同经历着全球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需要将其放到世界背景中去考察它的动态性，同时在转型中尊重自身的民族性。

教育活动作为深化和拓展博物馆传播成果的重要业务，亦不可避免地携带了上述特征：长于模仿、量化评判、专业受阻。因此，当西方博物馆“水到渠成”地将教育置于功能之首时，我国紧随其后，以“西学为用”，但这一忽视“中学为体”的效仿和速成带来的结果是：经历短暂绚烂繁荣后的内驱不足与专业乏力；作为最熟悉观众的教育部门深陷事务主义，在与展览等业务的合作中有时难以贡献确保观众获益的专业力量。

基于此，我在这里不想谈抽象的概念，只想谈具象的认知，期待与业内人员一起重新审视我国博物馆教育，尝试找到一些发展中的共性和突出问题，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博物馆教育拨开迷雾，让理性之光照亮前行道路。

一、溯源欧美：博物馆教育中的中西差异

在我国，从事博物馆教育具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合理性，对其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运用和具体操作上，不太深究其诞生的历史和原因，因此也很难发现中西的差异和我国的局限。众所周知，博物馆公共化大致始于17世纪的欧洲。18世纪初，欧洲重商主义发展、富商阶层问世、王室赞助减少，催生公众对艺术的浓厚兴趣。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又促使公众对科学和技术兴味盎然。19世纪初随着民族意识的形成，公众转而意识到博物馆还是保护国家历史和遗产的恰当机构。上述种种原因推动欧洲博物馆步入事业的勃发期。所以19世纪被称为“博物馆的黄金时代”，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此时创建了综合性博物馆，尤其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有100多座博物馆问世，德国至少有50座，美国也不乏重要博物馆降生。到19世纪后半期，以不列颠博物院院长威廉·亨利·弗劳尔爵士（Sir William Henry Flower）为代表的专业人士，开始倡导将研究性收藏和展览性收藏相分离，围绕研究和公共教育的双重目的组织博物馆，博物馆由此逐步被塑造成一类重要的教育机构。

毫无疑问，公共博物馆的理念缘起欧洲，但通过贸易、殖民主义，其将博物馆文化移植至世界各地。作为殖民地的美国，现代博物馆的源头大致可追溯至18世纪末。然而不同于欧洲，“错杂的权力网络和藏品的贵族属性决定了欧洲博物馆难以完全展现现代公共教育的平权理念，而真正符合当时进步主义思潮的博物馆教育只有在美国这样新建立的国家中才能实现”。该国的博物馆基本是在关注受众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致力于为城市居民提供教育机会，后来者居上，美国在教育方面日渐独领风骚。然而，即便是在20世纪初的美国，在专业教育者未出现前，革新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常态，多只发生在一些小地方，是一种小规模实验，也曾招致各种质疑与挑战。

然而吊诡的是，博物馆教育在一片反对声中不减反增。据统计，1932年只有15%的美国博物馆提供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但到了1960年却增至79%。显然教育已在博物馆内落地生根，但基本为一种次要功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博物馆教育部门预算较少、教育工作者办公空间不足，很少参与展品开发，在业务中也难以发声，Curator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1971年，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长李雪曼（Sherman E. Lee）曾提出：“我放弃了博物馆作为大众教育工具的理念。”美国纺织历史博物馆馆长托马斯·莱维特（Thomas Leavitt）呼吁将教育工作者置于Curator的监督下，“博物馆教育部门就像一个脱离大脑的神经系统，就像鸡被砍掉脑袋后的行为”。此时的博物馆教育正面临着与旧有思想和习惯行为上的对抗，但社会事态已发生重大转变：馆方亟须增加收入、观众日趋多元、学校系统陷入困局；作为公共机构的博物馆负有独特的道德责任。这些问题迫使博物馆无法固守轻视教育与观众的做法而必须做出改变：将观众置于中心并满足其崭新需求，长期与观众打交道的教育人员由此获得重视，专业组织相继被创建，教育实践亦逐步专业

化。自1997年起，英国政府也开始将教育定视作今博物馆的核心角色。20世纪中后期，全球博物馆工作重心由藏品、研究逐步转向教育，开始为创建一个有益于公众的教育机构而努力。2007年国际博协在修订博物馆定义时，甚至直接将教育调整为首要功能^①。至20世纪末，教育工作者终于赢得平等机会，并进入策展和营销团队，甚至担任副馆长、馆长等高级行政职务，成为博物馆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制定者。

通过回溯博物馆教育史，不难发现欧美尤其是美国对教育功能的倡导，乃是财富、权力、知识等不同力量形塑的结果，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下的自觉生发；但我国情况则迥乎不同，基本是“自上而下的官方倡导和由外而内的国际助推”两股力量下的产物，某种程度上，属被动接受，故容易出现思想认识上的混沌和实践摸索中的不求甚解。

19世纪中后期，一批外国人建立的博物馆落户中国。该背景下，我国于1905年首创南通博物苑，民国以后博物馆归属教育部门，被视为教育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属文化部，2018年改属文化和旅游部，由下设的国家文物局管理。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博物馆教育受苏联影响，设置了宣传教育部或群众工作部，重视社会宣传而非公共教育。自改革开放后，深受欧美影响，然而权威教化的模式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影响多浮于表层、未触及根本。

同时，由于在我国占主体的国有博物馆经费多来自财政拨款，财权和人事权均归属上级主管部门，所以对教育的倡导并非如欧美那般受内外环境所迫，具备立足民众需求的强劲动力，而若要促使我国戮力同心、积极行动，很大程度需要依赖自上而下的考核和激励。

二、名副其实与名不一定符实： 中国博物馆教育的当代困境

改革开放后，由于受到西方“教育为先”这一

^① 以上调整只限于英文版，在法文版中，博物馆功能的顺序没有变化。

观念的洗礼和实践冲击，以及免费开放后带来的观众激增，中国博物馆教育需求不断攀升。加之《博物馆条例》、馆校结合（合作）、“双减”、研学等政策出台以及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运行评估和“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等对教育活动的明确要求，促使社教工作突飞猛进并产生专业化诉求，“当前一、二级博物馆都设有专职教育职能部门，名称约有21种，以宣教部、社教部、讲解接待部最为多见，三级和未定级博物馆中少数未设专职教育部门”。教育岗位最常见的是讲解员，其次是教育活动策划，以及具有宣传交流性质的外联和网站维护。目前教育分工大致呈三种情况：教育人员和讲解员分属不同部门；教育人员和讲解员合一，教育人员既承担讲解又负责教育研发和实施；教育人员被细分为研发人员和运行人员，讲解员属运行人员。既有成绩主要表现为七：一是设立教育部门及专员；二是制定教育规划和方案；三是重视讲解；四是实施馆校合作；五是践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或科普教育）；六是注重传统节日和纪念日活动；七是参与研学。一言以蔽之，近年来教育活动正以多形式、多载体、多渠道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如研学、馆校合作等。博物馆教育所获成绩有目共睹，但这是否与“教育首位”名实相符，笔者认为并非如此。虽然我国教育活动已具备一定规模且呈常态化，成为诸多博物馆的标配，但在免费开放初涉教育的兴奋感褪去后，似乎陷入激情被无意识消解的“温水煮青蛙”状态，留下的相当一部分可能是依循惯性的简单重复。处在十字路口的博物馆教育在专业提升上举步维艰。作为一种设定和追求，“教育为先”本与博物馆理念的哲学性转变相适配，无疑具有积极的建设意义，但因我国未亲历转变的孕育之痛，“教育首位”基本为一种外部添置，某种程度上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原动力。基于对全国7家博物馆教育部门主任访谈及文献研读，发现目前主要存在三大困境，且头部大馆与地方小馆在诸多方面均呈现两极分化。

第一，因理念上不够重视，博物馆教育仍未从根本上获得尊重。首先，机构内部依然存在阶层分

化，教育部门在有些馆相较于研究、展览等部门地位较低，教育研究也长期遭遇偏废。当前获晋升的教育部门主任多出自具有前瞻意识的省市级馆，而中小馆的教育部门基本上仍在夹缝中求生存。该情况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相对稍好，因为科普教育本是这类馆中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其次，博物馆教育部门无法得到足够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在人力方面，教育部门人员不足，学历普遍较低，高学历人才多聚集在藏品、研究或展览等部门，但观众对教育深度广度的需求和期待却在水涨船高。此外，相当一部分为非在编人员，他们的职业价值感和工资均低，也欠缺展示机会及平台，因此教育人员稳定性较差。在财务方面，除部分大馆较为重视教育、经费相对充足外，中小馆的教育经费相较展览、文保、宣传、信息等部门往往更低。收费类教育活动尚未普及，但即便已开展的，创收也多用于馆内统筹，不少馆似乎也更看重文创收入和外部赞助，此举可能会使教育人员缺少一定积极性。同时，在使用经费时教育人员往往劳神劳力，教育活动开展越多，资金使用难度越大。

第二，因分工上不够合理，博物馆教育表面热闹实则身陷事务主义。一是缺乏整体规划，多数按教育活动进行分工。在人手匮乏的博物馆，教育人员身兼数职，既要负责活动研发实施，又要负责采购报销，还要负责稿件撰写和宣传。二是讲解属于教育活动的一种，却将讲解员与教育人员相区分，导致部分教育人员既不熟悉展览又不了解观众。三是讲解安排较为机械，缺少以需求为导向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如采用定时讲解，但实际到点可能未有观众，而需要讲解的团队却预约不到。甚至一部分馆还将语音导览业务外包。四是教育活动过于重视数量、速度和受益面，导致其工作节奏较其他部门更快且强度颇大，如临展前夕才将大纲交付教育部门，无论其对该主题熟悉与否都必须在短期内完成配套教育的策划。因此，教育人员周末、节假日上班或值班已屡见不鲜。五是新的教育活动——研学的异军突起，使现有分工仓促之间难以应对。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

2020年)》，推进中小学“研学旅行”的设想被提出，自此“研学旅行”作为素质教育的有力推手和旅游转型的全新方式，开始在全国频现。面对研学团体的涌入，作为研学旅行基地的博物馆一度混乱：有限的教育人员既无法接待好“来势汹汹”的外地团队，又不敢拒绝未经考核、水平参差的研学大队，甚至“野”导游在展厅公然抢讲解员“生意”，导致讲解质量难以保证，也影响他人观展。这些令教育部门殚精竭虑，头疼不已。

第三，专业化程度不够，博物馆教育活动量大但出现同质化倾向。该问题在三大问题中最为突出，可能出现在包括头部大馆在内的所有馆。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教育开发的高峰期大约出现于2010—2020年这十年中，教育人员面对新思想和新事物满怀热忱、不惧挑战，立足展藏品的教育体系已被初步构建，而今却陷入内容、方法和技术创新的瓶颈期，尤其是内容方面：不少活动遵循既成模式按部就班，如惯用“授课+参观+手工”三部曲，同时面对资源不足能省则省，但实则隐匿两大问题。首先，教育实践固然重要，但若无理论指导犹如盲人骑马、无所适从，然当前科学性和先导性兼具的理论和方法却乏善可陈。同时我们对教育研究本身充满误解，常常缺少特定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理论方法，多为案例研究，实证和思辨研究匮乏，未来需要对教育对象、资料和方法等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并使之构成系统。其次，教育活动缺乏较为明确的行业导向，对“最佳标准”莫衷一是，业界难以判定何为“好”的教育活动，尚未构建起由研究转化而成的共识，行业导向依然较为模糊。无论是定级、运行评估和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还是专门的教育评选活动，如全国文博社教十佳案例宣传推介活动、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都未对教育活动最佳标准做出较为清晰的规定。缺少目标导向的博物馆在既成经验和碎片研究中蹒跚起步、艰难前行。同时，尽管我国教育活动基数日趋庞大，但各类竞赛中获奖者基本为“十”，随着差额的扩大其既无法发挥代表作用，又可能丧失激励作用。最后，缺少教育

专业化提升的持续投入，包括人员的系统培训和活动的长期评估。除上海科技馆、湖南博物院等少数馆外，多数馆未对教育人员进行职业规划和专业培养。同时教育活动尚未开展长期评估，除一些具备持续性、衔接性的重点活动外，诸多活动的考核仅由教育部门内部负责人把关。综上，因教育缺乏理论指导，加之内部评估不足，外部定级、运行等评估要求粗放，所以教育活动效益无从知晓，专业化发展裹足不前。

三、十字路口的中国博物馆教育： 何去何从

通过中西比较和现状分析，获悉我国博物馆教育至少存在三大困境，那么究竟该何去何从，笔者主张从理念、实践两方面对症施策。理念上要反思教育在博物馆系统中的真实地位，功能之首并非表面附会，而要立足社会之需，借助考核和激励，赋予博物馆教育以内生力量；实践中，需要从底层逻辑上思忖如何与观众中心转向同步，通过采取分众策略、鼓励教育研究，以破解同质化难题，探寻专业化之路。

一是从理念上将教育置于博物馆有机体的核心位置，以切实提升人员地位。首先，博物馆正在重构新的生态系统，即一个复杂的文化复合体，教育在该系统中的作用已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知道，每个馆都有影响其运作的内部问题，同时身处动态、变化的世界中。为此，可将博物馆大体分为内、外两大系统，内部系统由博物馆的内外环境组成，而外部系统则由本地和全球环境组成，处于更广泛背景中的外部系统反过来会影响内部系统。20世纪70年代，菲利普·汉弗莱(Philip S. Humphrey)曾率先指出内部博物馆是隐藏的、维持运作的博物馆，而外部博物馆则是公众看得到的。当前，外部博物馆与外部世界的边界正变得模糊，思想和信息在博物馆与公众之间流动，博物馆与公众已构筑起共同所有者的关系，博物馆需要变得更为透明并及时回应观众反馈。基于此，全球博物馆都在尝试构

建新的生态系统，在该系统中有一类人员与此种改变最为相契，即教育人员。因为其工作精髓即是询问“谁是观众”并将他们的体验置于首位，而很多时候此并非管理者、研究者和策展者面临的首要挑战。所以大致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优先的做法是将博物馆教育活动置于生态系统中思考和分析后的重大改变。当前，欧美博物馆的教育已在新生态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机构由此获得重组：不主张将教育人员与管理、研究、策展人员相分离，其已成为各部门的构成部分。其次，该改变已影响至我国，为更好地构建起博物馆新的生态系统，我国需在理念上先认识到教育为先势在必行，并通过等级评估和各类评选活动，依据专业标准对教育活动进行考核和奖励，以倒逼教育人员地位的提升，促使其真正参与至博物馆各项业务中，发挥出与人沟通的桥梁作用。最后，应增加教育人员及经费。其一增加编制，在无法达成时增加项目制人数，并保障其合理待遇和晋升通道。其二拨付教育经费以保证基本教育活动的开展，并鼓励培育品牌类教育活动及探索收费机制，收费活动还可进入校园、企事业单位和社区，收入按一定比例奖励教育人员，剩余部分年底统筹。

二是实践上，首先采取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拆解问题，主张对教育进行脱胎换骨式的重新分工。与传统课堂教学不同，博物馆教育囊括的工种多样。笔者主张将这些错综复杂的工作大致分为三类，分别是教育活动研发、实施和观众评估。每类工作应有专人负责。

第一是教育研发人员，通常可设在教育部门较为大型，且馆方对教育研究重视的博物馆。职责是根据博物馆展藏品研发各类教育活动、开发数字教育资源和出版图书等，一般需具备博物馆学、教育学等硕士及以上学位。

第二是教育人员。其一，因博物馆教育对象多元，教育人员的分工也应根据目标观众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这有助于针对特定群体进行经验累积和跟踪研究，而我国当前多以项目分工，反而不利于积累教育活动的经验。同时在教育人员分组中，还可

添设后勤小组，专门负责采购、报销等保障教育的支持性服务。此外教育人员应重视志愿者建设，不仅使其制度规范，长短分期，还要注重挖掘潜能，使志愿者可独当一面完成全流程的教育活动。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3工作由志愿者承担，周末常规教育活动皆交付志愿者。其二，在教育人员与讲解员的关系处理上，一方面，不宜将讲解员与教育人员分开，因为当把教育人员按目标观众而非教育活动本身分工时，就会发现各类观众都需要开展针对性强的分众讲解，因此讲解工作将被分配至不同教育小组中。倘若分开，教育人员也须掌握讲解技能并要适时讲解。另一方面，遴选人才时不宜将教育人员等同于讲解员，应招聘博物馆学、教育学、各主题学科等复合型人才，学历以本科以上为佳，持有教师资格证者优先。同时由于教育人员学科背景多样，需系统开展与该馆相关的学科知识和职业伦理培训。如美国当代犹太人博物馆在改陈后全力打造专家教育团队，增加了2名全职家庭项目经理和5名兼职教学的艺术师。

第三是观众评估人员。在条件成熟的博物馆可设置在编评估人员，若尚未成熟，可将该业务外包给专业人士。评估人员需针对展教、服务等各项业务进行评估设计和实施，并将结果及时反馈给各部门以促使迭代改进。评估人员需要掌握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等评估方法和博物馆学、教育学等学科基础，具备硕士及以上学位，拥有观众评估经验者优先。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为向各类观众提供最佳的科学和文化体验，有专人负责评估、研究和制定政策（Evalu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通过教育活动评估，测试目标达成情况并予以完善；针对馆内家庭、学生观众和教育者的自然科学学习和教学展开研究；向各级政府提供立足研究的策略倡议。

当博物馆教育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专业化问题应被提上日程。教育的专业化实践不仅需要创建和更新当下的理论和方法，还需要全行业达成共识，制定行业标准，打破自我摸索且无的放矢的僵局。

其一，虽然教育学领域论著颇丰，但也尚未形

成体系，并鲜有人将其运用到博物馆教育实践中。适用于学校的教育学研究通常是在可控的中介环境中开展，而博物馆环境基本与之相对立，属于一种非正式环境中的自由选择学习，具有实物性、空间性特征。因此博物馆教育不等于学校教育，博物馆也不是学校的附庸课堂，博物馆领域不仅要针对性地吸纳教育学理论，更重要的是构建适用于自身的原创理论以推动实践创新。其二，目前博物馆教育缺乏行业专业标准。经验通常只能借助试错、模仿和天择来决定结果，因此充满随机和不确定性。早在1990年，美国博物馆联盟下的教育委员会就已制定《博物馆教育专业标准声明》，2005年其又开发出《卓越实践：博物馆教育原则和标准》，在教育标准化上可谓一马当先。笔者在内化以上成果基础上进行提炼，认为教育活动需要坚持可及性（Accessibility）、责信度（Accountability）和倡导力（Advocacy）三大原则。依据原则制定的基本标准为：在可及性指导下，聚焦所在地区的各类观众，适应社会的动态需求并具备多元视角，使博物馆教育覆盖文化、科学和美学，这是教育者的使命使然；在责信度指导下，能运用理论方法策划卓越的教育活动，观众可对其追责，因此要求教育者理论方法扎实，能针对个人和团体开展专业教育实践；在倡导力指导下，为了让观众获得优质体验，教育人员还得拥有较强的观众意识、团队精神和学习精神，并鼓励观众思考、探索。所以教育人员职业能力需要涵盖内容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教育实践能力、合作交流能力、职业态度精神等。未来需要不断返本开新，立足中国现状及其问题，持续在教育专业化上不断进阶。

四、余论

教育在当代博物馆功能中的地位一直是博物馆学讨论的话题，但毋庸置疑的是，博物馆在创建之始藏展合一，并不开展专门的教育活动，而今教育功能却被视作博物馆合理性存在的证明之一。通过上述论证，可得出以下四点思考。

第一，人进行认识的前提是在人认识之外存在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目前多数国家都已认可博物馆是教育机构。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博物馆皆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改变和调整。就中国而言，博物馆诞生之初，旨在启发民智、教化民众，具备社会教育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公众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博物馆教育逐步回归文化教育使命。

第二，目前博物馆教育在时间上已持续百余年，空间上已覆盖全球，所以只有将中国博物馆教育置于世界背景下才能更好探求其民族性。首先，需要认识到我国博物馆教育一直存在应然和实然的鸿沟，迫使我们重视教育研究和标准建设。尽管《博物馆条例》已将教育规定为目的之首，但在实践中并非如此，甚至存在隐性的拒斥，出现了实然不能推导出应然的逻辑困难。这是由我国的历史和过往决定的，同时这种民族性也决定了中国更应注重理论和行业标准。究其因在于我国管理体制为集中管理型，所以更应重视自上而下的行业导向并最大程度地保证其科学性与合理性。集中管理型对理论和行业标准要求甚高。因此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更应倡导教育研究，并将优秀成果吸纳为行业所用。其次，我国专业化提升需有意识地与社会保持联动，因为集中管理型容易造成主管部门的一言堂，将社会需求排除在决策外，使博物馆失去应有的活力。目前确有因该问题带来的差异化表现，如教育目标设定多重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传授，以提升能力为辅，而对价值观的培养不够深入。今后应当学习今后重视社会议题、倡导公民教育，在实施教育时已深度融入并参与社会建设，如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品牌教育活动“野生动物摄影比赛”，开展中已将环保理念根植于心、落实于行。

第三，强调理论和专业标准之于我国的重要性，并不代表它们只是本土产生的特色理论，与外国理论相排斥，是封闭的理论体系。因为中国博物馆及其教育活动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理论一般都是普世的，尽管“它们在具体的运用中会植入个

人立场和偏好”，但其在时间上具有累积性、空间上具有世界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不是搞一套别人看不懂、有悖世界学术潮流的体系，不是关起门来搞学术建设，而是学习世界学术，融入世界学术，贡献世界学术，从而彰显自己实力的过程。”所以，博物馆教育理论和行业标准不仅要吸纳教育学等相关学科成果，还要在批判和继承国际研究的基础上予以发展。

第四，博物馆教育的优势和缺陷兼具。优势首先是博物馆的真实物件、独特空间和一手资料都拥有巨大潜能，教育活动又因具备动态性、持续性和教育人员加入的交互性，给重新阐释博物馆物与现象以不同的机会和方式。其次，教育人员多为与观众直接接触的一线人员，对观众需求和兴趣最为熟稔，因此可以为其他业务部门提供观众视角，成为观众及观众体验的倡导者并努力确保观众享有优质服务。如针对展览业务，波利·麦肯纳-克雷丝（Polly McKenna-Cress）提出教育人员应作为观众权益保障者加盟其中。缺陷首先在于，社会对博物馆教育活动需求量大而实际服务能力有限，这是一个全球难题，但不应为扩大受益面，就以数量作为行业考核的唯一指挥棒，而是需重视如何提升专业化以促成更多观众获益。其次，博物馆教育与学校不同，受众更加多元，并且其结构会不断发生改变，所以需要持续开展观众研究以便心中有数、操之有方，如美国博物馆联盟的博物馆未来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Museums）早在2010年已预测出25年后的美国老人、少数族裔将增多。

“博物馆教育的未来会怎样”，这是一个恒常之问。必须承认，目前博物馆教育仍是一个相当新的研究领域，“教育人员需要被培养成可为公众创造特殊活动的教育家”。尽管该领域研究尚处襁褓阶段，但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教育人员需要不畏怯、不逃避，坚定地走在教育专业化道路上，并乐于参与到各部门业务中，成为观众体验的积极倡导者，促使博物馆中包含展览在内的各项业务，都能转化成适合你所在机构的观众的业务。无论如何，诚如苏东海所言：理论并不总是披荆斩棘，有时也会困

顿前进的步伐，当理论贫困时，还是让我们先做起来吧！

（致谢本文撰写中接受访谈的每位博物馆教育工作者）

以需求导向提升博物馆研究能力

黄 洋

202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Museums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多数情况下，博物馆行业和公众都更为关注作为“台前”的教育，虽然深知“幕后”的研究很重要，但由于人才匮乏、能力不足、体制机制不畅等原因，研究工作相对滞后。具体来说，博物馆研究应聚焦以下三点。

第一，应以藏品为中心进行科学研究。博物馆“无物不立”，藏品是博物馆一切业务工作的基础。博物馆都十分重视征集藏品，然而，“有藏品无研究”，这对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危害更大。例如一件文物可以从制作、设计、材料、使用、意义等多方面解读，各方面之间又是关联的；如选择何种制作工艺可能与材料本身的特性相关。同时每个方面又可以细分，如制作，我们可以研究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制作，是为谁制作的，为什么制作这件文物，制作的工艺和流程是什么？物都有“获得、制造、使用、维护、废弃（Procurement, Manufacture, Use, Maintenance, Discard）”的生命史。因此，博物馆对藏品的研究需要采用树状结构、关联结构、序列结构等，多方面构建藏品研究体系。

第二，应以转化为核心促进成果利用。博物馆的研究成果是开展展览和教育活动的学术支撑。博物馆要注重开展“研究型策展”，展览主题的凝练、展览脉络的梳理、展览框架的构建、展品内涵的挖掘都应该是基于研究成果的转化。除将现有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展览大纲和教育活动策划外，博物馆要重视“订单式研究”，陈列展览和社会教育的

工作人员应根据策划展览和教育活动的需要给研究人员下“订单”，提出具体的需求，说明需要哪些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样藏品的研究也更有针对性和偏重性，才能更有效地转化为展览和教育活动。

第三，应以共享为途径开展协同研究。在博物馆研究硬件设施不足和人才短缺的状况下，特别是中小博物馆，要善于借助外力，以博物馆为主体，整合利用各方资源开展协同研究。博物馆的发展需要更好的合作伙伴，需要人才和技术的支撑，同时高校考古、文博学科的建设，科研院所的学术研究也需要博物馆这个丰富的资源宝库。博物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各自发挥优势特长，强化协同创新，着眼于博物馆行业前沿技术、博物馆事业发展面临的关键技术，着力开展新时代的“产学研用”科技联合攻关，以高质量项目推动博物馆研究工作。目前，一些博物馆开展的创新团队等探索已取得很好的成效。

总之，博物馆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藏品资源优势，借助多方平台，开展系统深入的科学研究，研究真问题，挖掘藏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同时为公众提供丰富的知识和文化体验。

博物馆高质量、可持续致力于教育与研究的探索实践

杨瑾

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Museums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强调博物馆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教育机构在培养学习研究、探索发现与文化理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是国际博物馆协会自2020年之后配合与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又一具体举措，今年将聚焦“目标4：优质教育——确保包容与平等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目标9：行业、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邀约人们重新思考博物馆教育、构想一个跨越边界传播知识的、创新与传统相结合的未来。这一主题包含两层意蕴和两个行动主体：博物馆致力

于教育与研究的意识与能力、如何使博物馆高质量与可持续地致力于教育与研究。前者表明博物馆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后者反映博物馆作为客体的外在驱动力。显然，在当下“博物馆热”背景下，前者生机盎然；在社会参与环境下，后者“声音”渐渐加强，不时产生一些“热搜”话题；在馆校合作政策支持下，二者互构互融，有成就，也有掣肘。如何破解后形成通融性互惠互利的教育与研究共同体？与博物馆教育相关的社会机构应参与其中，促进博物馆自身不断提高教育与研究水平，并为社会教育和研究创造更多价值，但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则需要内部强力基础上的多维合作。

笔者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历史教师教育与博物馆教育教学体系建设为例，探析一种前置性、嵌入性的博物馆教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探索。

第一，探索融合型历史教师教育与博物馆教育教学。将博物馆与历史教师教育作为教学与研究对象。历史教育是培育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博物馆教育与高校历史教育具有相类似的功能和实践，兼具教育实施与教育研究双重使命。当前学界关于博物馆与历史教育的研究主要关注博物馆或博物馆资源与初高中历史教学、博物馆资源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博物馆资源与高校历史课程、博物馆教育课程设计、博物馆教师教育、博物馆教育与历史教师教育，显示了国家教师教育战略中，博物馆教育与教师教育的适配性与必要性，而较少考虑历史教育对象与博物馆教育实施主体之间的关系。

第二，将博物馆学作为历史教育专业的学科教学内容。学院历史学科下设历史教育学、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文博等专业，历史教育学包括公费师范生、国家优师专项计划师范生和普通师范生，文物与博物馆学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和省重点学科，为博物馆学融入历史教师教育提供了优势资源。

近年来，学院打破既有的教师与教学机制体制，文物博物馆学科教师与历史教育学教师合作，为历史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本科和硕士）开

设博物馆学课程，在馆校合作背景下积极探索大历史教育与博物馆教育及研究相结合的机制化、专业化、国际化新路径。

第三，展开历史教师教育机构化与国际化的实践。在学院下成立研究机构“历史教育国际协同研究中心”，下设博物馆国际教育研究方向，开展博物馆与历史教师教育专题研究，举办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文化与理解：历史教育的使命（2022）”“历史教育与文明互鉴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2024）”等，在研讨会中均设立“博物馆资源与历史教育”议题，在馆校互动视域下研讨博物馆与历史教师教育、博物馆资源与初高中历史教学或课堂教学等问题，构建博物馆学与历史教师教育二者融合的学术研究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

此外，还开设历史教师教育国际课程，打造精品国际合作教育课程与全球合作教育项目。2021年春季开始，目前已与国外12所大学完成线上合作教学。课程共6次，内容包括教育平等（Educational Equity）、教育评估（Educational Assessment）和课程管理（Class Arrangement）等。设立中德历史教育与文化交流在线课程（世界历史与历史教学）。2021年开始，与德国奥格斯堡大学人文历史学院合作线上课程“世界历史与历史教学”，每期14次课，课程包括历史教育体系、课堂教学法、历史教学主题、历史教学的历史观念与历史文化、项目组学习法与课程材料等。2022年起加入文化遗产教学和博物馆教育内容，国内6个师范院校历史教育专业的师生参与了这一课程。

上述理念与探索实践在文化教育越来越重要的当下，特别是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育的意见》（文物博发〔2020〕30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办发〔2021〕40号）之后有着积极意义。今后，我们将在两个方面继续探索实践。

一是聚焦难点与痛点。当前博物馆和学校双方均有合作教学的诸多诉求，但馆校之间能够开展高质量合作的双跨型教育教学人才的培养与提升平

台不足，特别是缺乏兼通博物馆资源与校本教学的“博物馆教师”或“教育员”。因此，我们尝试在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和历史教育学之间，开发博物馆历史教师或教育员的专业培养与学科教学的潜能，试图建立前置性培养体系。在数字教育时代将全球教育、历史教育、博物馆教育相结合，将博物馆课程嵌入历史教育本科课程体系，培养既能在博物馆从事校本教学的博物馆教育员，又能在学校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课堂教育或核心素养教育的博物馆教师。

二是加强学术研究。一方面，针对博物馆教育研究不足的现状，我们与奥格斯堡大学从事历史教师教学的专家合作，开展博物馆资源与中学历史教育结合的理论研究、博物馆资源与中学历史教育融通研究、博物馆教育与高校历史教育专业教学的主题研究，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与科学评估，如基于项目式学习的馆校共建课程、博物馆与初中历史教学新课标等，探讨历史教育学在培养未来与博物馆合作校本教学的“博物馆教师”或博物馆“教育员”方面的中介作用，通过双跨型“人才”的培养满足馆校高质量合作历史教育的共同需求，通过提高教学一体化水平以完善馆校协同育人机制。另一方面，研究博物馆教师或教育员如何通过项目制，引导或指导学生进行历史研究，培养学生的研究思维、提升学生历史研究的科学素养和数字学术能力。

唯有此，博物馆致力于历史教育、历史写作与研究才能获得更广阔的拓展空间，也能保证博物馆高质量地、可持续地致力于包容性的社会教育和创新性的学习研究。

中国博物馆教育和研究成就与反思

丁福利

一、中国博物馆教育的成绩

2022年全年，全国博物馆举办教育活动近23万场；接待观众5.78亿人次；推出教育活动4万余场；

网络浏览量近10亿人次，新媒体浏览量超过百亿人次。2023年以来，“博物馆热”“研学潮”“云教育”，一次次体现了中国博物馆教育的影响力。博物馆教育的供给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已经完美实现“双向奔赴”；博物馆教育实践已深度融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

博物馆教育实践与国家发展战略同向同行。各地、各级、各类博物馆教育实践立足不同的博物馆定位和所在区位，主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以及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大运河文化、长征文化、长城文化、文明探源等党和国家重大战略与决策部署，源源不断地推出教育品牌项目与活动。博物馆教育实践已深度融入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发展大局。

近年来，中国博物馆“云展览”“云直播”“云讲解”“云课堂”等现象涌现，“云教育”成为博物馆教育的一种全新的业态，博物馆教育的覆盖面、影响力呈几何数字、天文数字暴增。“云教育”已成为新常态，亿万公众再也离不开掌上博物馆和博物馆里的数字化教育服务。博物馆教育实践已深度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

进入新时代，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用品牌建设回应高质量发展的呼唤与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教育品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大馆到中小博物馆，从博物馆人的自发探索到行业协会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推介、导向引领。一批又一批享誉全国的教育品牌推向社会，走进人民美好生活。我国的博物馆教育品牌战略和品牌建设从不自觉到自觉。博物馆教育实践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流。

有关数据表明，近些年来每年博物馆教育方向的论文、论著发表及出版数量在全国博物馆学界始终处于领先的位置。质量也毫不逊色。回顾中国博物馆协会主办、三年一届、含金量较高的“全国博物馆学优秀学术成果”评选推介活动，在截至目前已经举办的三届评选结果中，博物馆教育方向在入选论文、译文、著作、译著四大类中的占比始终高于其他研究方向的成果。这些优秀成果从不同

角度直观呈现了我国博物馆教育研究的综合水平，成为我国博物馆教育实践高水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中国博物馆教育面临的挑战

中国博物馆教育虽然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仍存在一些制约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和挑战。

一是博物馆教育实践领域普遍存在“轻研究”问题，高校教研领域普遍存在“轻实践”问题。博物馆与高校合作、互补力度不够，未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二是中小型博物馆与大型博物馆差距明显，中小博物馆亮眼的实践案例少，其研究成果更是偏弱。

博物馆教育实践和研究与博物馆定级和运行评估导向脱节。有些博物馆，包括一些大馆、名馆，对评估机制的“方向盘”“导航仪”作用认识不足，在博物馆教育实践和研究等方面，对标对表不够，导致“偏航”失分，评估排位与应有地位落差较大。

对博物馆教育实践优秀案例的行业推介与品牌化亟待整合与提升。有关“国”字头的行业组织和单位，分别牵头开展了冠以“十佳”“百强”之类不同主题与内容的教育案例评选和推介，对激励和引导博物馆教育品牌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声出多门且周期不定、标准宽严不一。

博物馆教育研究的激励机制单一，动力不足。目前全国性的博物馆学研究成果评优推介，仅有三年一度、实施十余年的“全国博物馆学优秀学术成果”评选推介活动。随着业内对博物馆学研究的不断加强，面对三年间累积海量且日益攀升的研究成果，其评选显得周期过长，而且申报不分赛道，入选总数量控制也十分严苛，激励面过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博物馆人从事科研工作的热情和动力。

在博物馆教育实践领域，人才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从历次全国博物馆定级和运行评估看，博

物馆教育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在数量特别是质量方面，均明显弱于实践成果，表明其研究型人才不足。从近些年全国博物馆教育优秀实践案例申报与评选推介看，相当一些博物馆申报并获奖的案例属于改头换面、粉墨登场的多年“老面孔”，这又表明其实践创新型人才缺乏。

三、中国博物馆教育的未来与展望

展望未来，博物馆教育仍应**加强理念引领，从顶层做起，提高对博物馆教育和研究的认识**。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要从发展理念上牢固确立博物馆教育在新时代的核心价值，理解教育是博物馆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固确立研究在博物馆教育实践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引擎地位。二是要科学认识教育实践与研究的辩证关系，推动二者协调发展。着力纠正“重实践轻研究”和“重研究轻实践”两个极端倾向，解决好实践与研究之间、大型与中小型博物馆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加强人才队伍，优化提升博物馆教育和研究的核心竞争力。从最根本的角度观察，一个博物馆或博物馆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其终极的核心竞争力莫过于“人才”二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①因此，博物馆教育和研究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人才队伍建设摆在优先与核心的位置。当务之急，则是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着力解决好博物馆教育领域研究型、创新型人才匮乏的问题。

加强推介性品牌建设，整合优化博物馆教育和研究的行业激励机制。一是面向博物馆教育实践，由国家文物行政部门牵头指导整合，由博物馆

行业组织联合各相关领域和单位，聚力打造一个更高层次、更具权威、更加包容、更加科学合理的“年度全国博物馆教育案例十大精品”推介活动崭新品牌。着力解决声出多门、周期不定、标准宽严不一、含金量不足等问题。二是面向博物馆教育研究，推动“全国博物馆学优秀学术成果”评选推介活动适当缩短周期、扩展入选论文，开设多元赛道，将“博物馆教育”作为独立赛道组织申报评选。着力解决博物馆教育研究动力不足问题。

加强对标评估机制，确保博物馆教育实践与研究永不偏航。国家文物局近年发布的《博物馆定级评估标准》，由国内顶尖专家团队立足新时代，在总结以往经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博采国际之众长，是我国博物馆建设与运行的“方向盘”和“导航仪”，最具有权威性、指导性、规范性。对此，我国博物馆的管理者和博物馆教育实践者、研究者，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保持清醒认识，在行动上更加自觉对标、予以充分响应。着力解决好博物馆教育实践与研究“偏航”的问题。

加强科学规划，确保博物馆教育和研究“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是要高度重视规划。坚持“规划先行”，牢固树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科学发展理念，统筹做好战略布局，力戒急功近利、随意跟风，避免短视和短期行为。二是要高起点做好规划。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更加主动地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党中央有关重大决策部署、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主流，以只争朝夕、“弯道超车”、“换道领跑”的状态，从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规划与政策中找准位置、明确方向、树优目标、定好标准，制定好中长期发展“线路图”。三是要高质量落实好规划。要科学分解、分期实施规划，让规划与年度计划挂钩接轨，在每一个年度计划中条条落实、件件落地。着力确保博物馆教育和研究“一张蓝图绘到底”。

① 习近平. 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J]. 求是, 2021(6).